

此发言稿于1957年7月5日全文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这便是著名的《新人口论》。但是,让马寅初意想不到的是,他苦心积虑换来的却是灾难。

马寅初“人口论”遭批始末

1954年,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马寅初前往浙江省视察。调查中他发现中国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,每年增长在千分之二十以上,每年净增人口约1300万。1955年,他根据在浙江、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,结合其他省的资料,再参照外国资料,写出了一份题为《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所》的发言稿,准备在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。为慎重起见,马寅初先将发言稿交给浙江省人大代表小组讨论征求意见。有代表认为,他的观点与马尔萨斯同出一辙。听到这话,他意识到此时的气氛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,因此主动将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来。

尽管遇此挫折,但马寅初并不气馁,而是继续深入调查研究,为人口问题的提案作更充分的准备。1957年3月2日,马寅初终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“控制人口”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。4月27日,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就中国人口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演讲。6月,他以这次报告稿为基础进行加工整理,写成书面发言稿,然后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。此发

言稿于1957年7月5日全文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这便是著名的《新人口论》。但是,让马寅初意想不到的是,他苦心积虑换来的却是灾难。

1958年初,《光明日报》开辟专栏批判马寅初。与此同时,《文汇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新建设》、《经济研究》等全国性报刊也都陆续发表文章批判马寅初。1958年5月,党的“八大”二次会议的“工作报告”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“新人口论”。1959年9月5日,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,论述当前国内外形势。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公诸报端,在北京最著名的五大高校负责人中,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,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,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,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,唯独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由副校长陆平代之。在那个一切讲究政治待遇的特殊年代里,一个人是否出席某次会议往往是解读其政治命运的一把钥匙,显然马寅初的政治命运已定。

1959年12月24日,“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”召开大会,由马列主义教研

室的教师作《批判马寅初人口论》的报告。第二天,马寅初在《北大校刊》上发表了《重申我的请求》,他声明:“我虽然年近80,明知寡不敌众,自当单身匹马,出来应战,直到战死为止,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。”此时,马寅初已身处逆境,但他担心的不是个人的前途、命运,而是担心怎样才能捍卫学术的尊严和独立性。

日后,在谈到这段经历时马寅初坦然地说:“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,有几位朋友力劝我退却,认一个错了事,不然的话,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。他们的劝告,出于诚挚的友爱,使人感激不尽;但我不能实行。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,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。学术问题贵乎争辩,愈辩愈明,不宜一遇袭击,就抱‘明哲保身,退避三舍’的念头。相反,应知难而进,决不应向困难低头。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,没有把握,不要乱写文章,既写了之后,就要勇于更正错误,但要坚持真理,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生命的性命,有所不利,亦应担当一切后果。”

(据《文史月刊》)

鲁迅理发

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,经常是几个月才理一次发。有一次,先生走进一家理发店,理发的师傅看见他长发垂耳,衣着寒酸,心中看他不起,便马马虎虎地一理了事。理完之后,先生不动声色,随手抓了一把铜圆,数也不数,直接塞给那师傅,然后飘然而去。那师傅接过铜圆一数,发现竟然比牌价多出几倍,一时又惊又喜。

过了一段时间,先生又来这家店理发,衣着打扮,一如既往。那师傅认得是上次来的那位“阔佬”,立刻殷勤起来,又是端茶,又是敬烟,理起发来,也是一丝不苟。理完之后,先生不慌不忙掏出一把铜圆,看了一眼牌价,然后小心翼翼地挑出几个,如数付款,一个儿子也不多。理发师傅接过钱来,脸上写满失望之情。先生看在眼里,便笑着说:“上次你给我乱剪,我付钱也就乱付;这次你剪得很规矩,我也只好规规矩矩地付钱。”

对于那位势利的师傅,先生既没有大发雷霆、拂袖而去,也没有苦口婆心、谆谆教诲,而是不失时机地幽上一默,让人在一笑之中,若有所悟。

这便是鲁迅先生的可爱之处,嬉笑中暗藏玄机,温和中透着睿智。

闻一多卖艺

闻一多先生自嘲说自己是个教书匠兼手艺人,教书匠是指在大学教书当教授,手艺说的是自己会刻图章活儿。不过他的手艺当年确也让他窘困的生活得到了不错的改善。

那是上世纪40年代,全国通货膨胀,物价飞涨,闻一多虽为大教授,但所拿薪水却无法解决一家8口的衣食。于是有朋友对他说,俗语说得好,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你有会治印的手艺,何不给人刻图章赚些钱贴补家用。于是他无奈地鼓足勇气拿起了刻刀。后来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:“弟之经济状况,更不堪问。两年前,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。乃开始在中学兼课,犹复不敷。经友人怂恿,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。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。”大半收入来自于刻图章,这对生活的改善意义颇大。

然而,中国文人向来清高,以谈钱财为耻,闻一多先生也不例外,他刻图章不直接出面接收,而是委托昆明青云街、正义路上的几家书店代为收转,很是有点羞羞答答的意味。

闻一多先生的儿子对父亲刻图章卖钱的举动也是十分不理解,并且多有訾语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。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闻一多先生何不明此义?然而,俗话说,一钱逼死英雄汉。因此他只能对儿子说:“你的话我将一辈子记着。”闻一多先生为生活所迫进而卖艺刻图章,其内心的酸楚可想而知。(据《绍兴县报》)

蔡元培为下属邀请信措辞不当道歉

胡玉缙是近现代文学家、学者,编撰有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》60卷等史学典籍。但在民国初年,其人其学尚不为世人所知。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有一次偶然看到他的一篇文章,觉得写得史料翔实,章法得当,不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,有意将他聘请到部中任职。于是他当即指示下属给胡玉缙写了一封信,表达求贤若渴之意。可出乎预料的是,胡玉缙在接到邀请信后非但没有感激涕零,反而给蔡元培写了一封抗议信。

胡玉缙之所以要写抗议信,是因

为对邀请信中的措辞感到不满。邀请信是这样写的:“奉总长谕:派胡玉缙接收(教育部)典礼院事务,此谕。”原来,书生味很浓的胡玉缙是揪住了“谕”和“派”两个字,认为“谕”和“派”都是上级对下级的行文,乃必须服从的意思,而他胡玉缙既没有答应也还没有到教育部上班呢,根本不存在什么上下级关系,蔡元培怎能“谕”之于他,所以胡玉缙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事情,遂写信表达抗议。

蔡元培得知此事后并没有认为

胡玉缙是小题大做,而是为此深感不安,他当即给胡玉缙复信表达歉意,称“责任由我来负责”。

部属行文措辞失当,这原本与自己无关,然而蔡元培却主动承担责任,诚心向人道歉,此事看似微不足道,却折射出了蔡元培严于律己、宽于待人的高尚风格。正是由于他崇尚“思想自由”、“兼容并包”的治学精神,开一代风气之先,才造就了民国时期群星灿烂、文化鼎盛的大好局面,不愧为是“学界泰斗、人世楷模”。(据《国学》)

陶行知撰写的通俗对联



陶行知先生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,而且也是一位撰联高手。其联语不但对仗工整,构思精巧,而且深入浅出,通俗易懂。这里仅摘录部分,以飨读者。

行知先生的乳名叫“文浚”,因为长辈们希望他成为一个文化渊深的人。他从小刻苦学习,23岁在南京金陵大学毕业,名列全校榜首。当时他信奉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的学说,遂改名为“知行”。后来他又赴美留学,深受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器重。

回国后,他倡行杜威的教育学说,但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行动才是求知的先导,因而自觉地批评了王阳明和杜威的一套旧学说,毅然改名为“行知”,并为此特撰联一副:“行是知之始;学非问不明。”联语赤诚明朗,且又大众化、口语化。

“五四”运动后,陶行知先生效力于“平民教育”,并与安徽教育界人士在南京创办了“安徽公学”。其时,陶行知先生既任中华教育社总干事,又任南京高师教育长,还兼任东南大学教育系主任。虽然工作十分繁忙,但他还是经常去安徽公学参加活动,并为公学亲笔手书通俗格言联一副:“义则居先利则居后;恕其所短敬其所长。”联语虽短,其意深长。

1927年,陶行知先生在南京郊区

——燕子矶边创办了一所“晓庄师范”,他号召师生们要拜农民为师,并带领师生们自己动手创建校园。其间他还特意为学校撰写了两副通俗对联,其联一:“以教人者教己;以劳力上劳心。”其联二:“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;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。”后来,这两副对联成了师生们的座右铭。

1929年,陶行知先生派人到苏北淮安创办了新安小学,自己兼任校长,学校实行半耕半读,互教互学。1930年,晓庄师范学校被反动派强行封闭,造成经费十分困难。面对困境,陶行知先生并没有半步退让,而是积极筹款支援,并又亲自撰联一副:“捧着一颗心来;不带半根草去。”联语简意赅,这就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自我写照,并一直流传至今。(据《人民教育》)